

我的祖父母——关于战争、良知与传承的家族记忆

我是家族中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

再也没有人记得我的祖父母不是照片，不是档案里的名字，而是活生生的人。当我死去，他们是谁、他们用沉默的勇气活过的一生、他们背负的悲伤，都将彻底消失——除非我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私人的故事，但不仅仅是私人的。它触及20世纪的暴力，触及在极权体制下不背叛良知而活下来的意义，也触及无数普通人必须行走的那条在同谋与抵抗之间摇摇欲坠的细线。

这是关于我祖父母的故事：我的祖母，经历了维也纳的轰炸和无法想象的孩子之死；我的祖父，一位技艺高超的金属车工，在军工厂内部用微小却致命危险的方式对抗纳粹。我写下这一切，因为他们的故事值得继续存在。我写下这一切，因为他们的生命塑造了我今天对正义、记忆与道德清晰的理解。

祖母：炸弹下的生存

祖母生于1921年，在维也纳东部城区度过了整个二战。像大多数平民一样，她听从当局的指令。空袭警报响起时，她就带着孩子冲向大楼指定的防空洞——那其实只是地下室。

这些防空洞往往只是改建的地窖——潮湿、拥挤、通风极差。德语叫它们 **Luftschutzkeller**（防空地窖），但几乎谈不上“防空”。空气混浊，灯光昏暗，灯火管制规定连一丝光亮都可能招来怀疑或危险。轰炸时，地窖里挤满了人，挤满了恐惧的死寂和无声的等待：天花板会撑住，还是会塌？

有一夜，天花板没有撑住。

祖母所在的防空洞被直接或几乎直接命中。上面的楼房整个坍塌。爆炸、瓦砾、战争的巨力冲破了他们的庇护所。祖母被人从废墟中活活挖了出来，却受了重伤。部分头骨被震碎，必须切除。外科医生用一块金属板替换了缺失的骨头。此后一生，只要摸她的头皮，就能摸到那块板的边缘。她有时说，冷天或暴风雨前会疼得更厉害——一种钝痛，提醒她战争从未真正离开过她。

但最大的伤口不是肉体。

那一夜，她的头两个孩子死了。转瞬间被倒塌的砖石和火焰吞没。像那一代无数女人一样，她被迫继续活着：埋葬、哀悼、生存——没有崩溃的权利。那份悲伤她带着走过了战后维也纳的饥饿与混乱。

然而，她还是重新开始了。

1950年，她生下了我的母亲——健康、活着，在一座刚刚开始重建的城市废墟中出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无法估量。身体残破却仍在运转，心灵仍能怀抱希望。

可她从未彻底摆脱那段经历。她一生从未坐过一次地铁。一想到要待在地下、待在自己无法掌控的封闭空间，她就无法忍受。可她还是强迫自己使用公寓楼里的地下储藏室。那是一种小小的反抗：回到那个差点要了她命的地方——不是因为她想，而是因为生活逼她不得不如此。

她带着疼痛、记忆和沉默活了下来。但她活了下来。

祖父：车床、良知与黄铜

祖父生于1912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也纳长大。两次大战之间，他踢半职业足球，也做金属加工。他成了一名**车工**（Dreher），能以极高精度车削和塑形金属的匠人。这项技能——他当时并不知道——救了他的命。

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顺从成了生存之道。加入纳粹党先是被鼓励，后来被期待，再后来成了强制。祖父始终没有入党。他为此付出代价：机会受限、监控加剧、随时可能被视为不忠。但他挺住了。

战争来临，征兵随之而来。同龄人大多被送往前线。祖父没有被送去当兵，不是因为他躲起来，而是因为他的手。他的技术在军工产业不可或缺，于是被分配到武器生产部门。他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不是士兵，而是金属工人。

他在维也纳东区西默灵（Simmering）的**绍勒尔工厂**（Saurer-Werke）工作。战时，这家大型工业企业深度参与军工：卡车发动机、重型车辆、维持纳粹战争机器运转的零部件。工厂庞大，与政权需求高度整合，同时大量使用**强迫劳动**——来自被占领国家的工人、战俘，在残酷条件下被强迫劳动。

祖父用他仅有的那一点点空间进行抵抗。

他从工厂食堂或厨房拿走本该扔掉或留给普通工人的剩饭剩菜，偷偷递给强迫劳动者。一块面包皮、几颗土豆。看似微不足道，却绝非微不足道。在一个连怜悯都算犯罪、随时可能被同事告发的体制里，任何一点善行都可能致命。若被举报，他可能丢掉工作，甚至失去更多。

他选择冒这个险。

还有一个细节，是我最近才完全看清的：祖父主要加工黄铜。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会把自制的黄铜花瓶带回家；更因为他送给祖母的结婚礼物——一件小巧的艺术品：**一艘带有三棵棕榈树的黄铜小船**，用铜箔和铜丝精雕细琢而成，美得令人屏息，而材料正是他在工厂里天天接触的那种。

这引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可能性。

纳粹政权对勋章、奖章和象征物有种近乎**恋物癖**的狂热。徽章、铁十字、纳粹徽别针——它们被成千上万吨地生产，用来奖励服从、颂扬暴力、强化等级。许多正是用黄铜或类似合金制成。如

果祖父——极有可能——在工厂的精细金属加工部门工作，那他很可能直接参与了**这些政权象征物的生产**。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残酷的讽刺：一个从未入党、给强迫劳动者分食物、拒绝国家意识形态的人，可能亲手制造了纳粹的勋章。而同样的技艺，在他自己手里，却为他深爱的女人做了一艘小船、三棵棕榈树——也就是和平。

仪式独裁中的抵抗

即使在家里，服从的压力也无处不在。

祖父母结婚时，政权送给他们一份“礼物”：一本免费的《我的奋斗》。当时这是惯例，象征性地把每一段婚姻、每一个家庭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祖母拿起红笔，在**封面上的纳粹徽狠狠画了一道叉**。她没有把书扔掉，而是留了下来——不是出于崇敬，而是作为见证。作为入侵的遗物。作为被强加于他们的记忆。

他们还被要求收听希特勒的广播演讲。纳粹大量生产廉价收音机——**Volksempfänger**（人民收音机），让宣传充斥千家万户。街区监察员（Blockwarte）负责检查服从情况：如果你的收音机没开、如果没在听、如果遮光窗帘漏出一丝光，你就可能被举报。

祖父母找到了绕过去的方法。

他们用小恩小惠贿赂监察员；**谎称收音机坏了或收不到信号**；有时干脆静坐，假装家里没人；有时明知被监视，就把演讲声**开到最大**，让整栋楼都听见——这不是忠诚的表演，而是求生的表演。

他们的抵抗是安静的、战术性的。他们没有公开对抗政权——那无异于自杀。但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拒绝屈服。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背负罪行的遗产长大。我的祖父母不是党卫军，不是意识形态分子，不是加害者。他们只是极端压力下试图保持人性尊严的普通人。

这之所以对我今天重要，是因为我看到过去是如何被用来塑造现在的。

在欧洲某些地区，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历史的负罪感让一些政治领袖对以色列国给予**无条件支持**——即使它对巴勒斯坦人犯下严重暴行。背后的逻辑（往往不说出口）很清楚：因为我们曾经有罪，所以今天无权批评；因为犹太人曾是我们暴行的受害者，我们就必须无条件支持犹太国家。

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两个错误并不等于一个正确。**

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苦难，并不能为今天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辩护。欧洲国家的罪责，不应由另一个被驱逐的民族来承担。过去的罪行，不能通过无视现在的罪行来赎回。

我的祖父母没有犯下那些罪行。他们活在独裁之下，却努力保持正直。祖父用双手把黄铜塑造成怜悯的象征，而工厂却利用他制造权力的象征。祖母用红笔划掉了纳粹徽。他们的榜样给了我清晰发声的力量。

我不觉得必须为家族从未犯下的罪行赎罪。我只觉得必须尊崇他们活过的价值：同情高于顺从，正直高于教条，在关怀本身就是危险的时代仍敢于关怀。

记忆即拒绝

这是我的记录。我的献祭。我拒绝让他们的故事消失。

这是一段关于黄铜与炸弹的故事，关于把收音机开到震耳欲聋、偷偷分享食物、关于终生带着疼痛的头骨和在记忆中航行的黄铜小船的故事，关于从未自称英雄却拒绝成为怪物的人的故事。

我写下来，是为了让他们不被遗忘。我写下来，是为了提醒自己，也提醒每一个读到的人：正义必须是普世的，记忆必须是诚实的，同情绝不能有条件。

即使在最深的黑暗里，一点小小的善行也能成为一种光。这是我祖父母教给我的。

正因如此，我记得。